

谷霁光

史学文集

• 第一卷
兵制史论



• 江西人民出版社 • 江西教育出版社

第一卷·兵制史论

谷霁光史学文集

江西人民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



《谷霁光史学文集》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 周銮书
副主任委员 姚公骞 梁凯峰
委 员 左行培 邵 鸿 张居中
(按姓氏笔划) 林学勤 周銮书 周声柱
姚公骞 秦光杰 梁凯峰
黄今言

书 名:谷霁光史学文集(第一卷)
出版发行:江西人民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5号)
江西教育出版社(南昌市老贡院8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江西省新闻出版学校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9.5
字 数:450千
印 数:1—1000
版 次:199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价:28.35元
书 号:ISBN 7-210-01148-X/K·110

邮政编码:330002 330003

(本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谷霁光史学文集》序

周銮书

由我来写《谷霁光史学文集》的序，实在勉为其难，用“不自量力”四字来形容，倒是恰如其分。

谷霁光先生是我的老师。1950年我到南昌大学文史系读书的时候，他是学校的教务长兼文史系主任，主讲我们班上的中国通史课。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他来给我们讲授武王伐纣。他是史学界很有名气的教授，同学们都用倾慕的眼光注视他，非常恭敬地起立向他行鞠躬礼，他也亲切地向大家点头致意。这时我才看清楚他大约40多岁，身材中等，结实健康，微黑的脸膛泛着光泽，神色显得质朴醇厚。十年后，姚公骥同志赠送给他一首诗，第一句就说：“天生一副农民相”。当时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感觉谷霁光先生有一种农民气质的学者风度。他翻开讲义夹，开始授课。他引证不少史料来证明他的观点，论证缜密严谨，无懈可击，使我们不得不服。他在讲授时，思想集中，全神贯注，眼睛不看同学，也不看别处，偶尔瞥一下天花板，惟恐什么东西影响他的思绪。我们感到他不像在讲课，全部身心都沉浸在高度思维活动中。

后来，我们逐渐从他的助手和熟悉情况的老师那儿了解到他的过去。他1933年在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任雷海宗教授的助教。1936年9月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同时在该校经济研

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在这期间，与吴晗、罗尔纲、汤象龙等创办《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天津《益世报》史学副刊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南下滞留长沙，次年福建厦门大学历史系任教，一度任系主任。1946年转到江西中正大学。1949年解放，中正大学改名为南昌大学，我们正是改名后他的第一班学生。

在长期的学校生涯中，他一直以教学为主，结合教学开展史学研究。他常说，“教学是基础，科研是主导，教学促进科研，科研提高教学，二者互相促进，互为因果，并不断使二者向广度、深度发展”。他以此律己，也以此教人，五十多年如一日，身体力行，从不稍懈。

对他来说，教学的范围有多广，研究的范围就有多广，其实研究的范围要更广泛得多。上逮远古，下至晚清，涉猎数千年。这部文集集中的100多篇论文，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也不是漫无边际，研究的重点在历代的军事制度和经济制度。他的成就，也主要集中在这两方面。如他在28岁时撰写的《补魏书兵志》、《唐折冲府考校补》两篇文章，载入《廿五史补编》而受到史学界的注目。60年代初出版的《府兵制度考释》一书，更为国内史学界普遍重视。正如作者在《考释》的“引言”中提到的：“作为封建主义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府兵，是与当时封建经济基础的变化相适应的，是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它随同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而演变着。毫无疑问，府兵制度研究，不仅涉及整个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历史发展规律，而且涉及到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谷霁光先生通过府兵制度这一专项研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宏观着眼，微观着手，宏微相济，上下贯穿，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在全方位和多角度上，到处显示出考订兼详，论证透辟，识见弘深，是对府兵制研究的最高成果，日本和英、美的一些汉学家也备加推崇，甚至台湾书商也一再复印。“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科学院曾准备给该书以奖励，因动乱冲击而未果。他在经济制度研究方面的成就，较集中地体现在《中国古代经济史论

文集》和王安石变法的专题论文中，如《论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一文，从史料的钩沉索隐中，得出了王安石变法是不自觉地利用商品经济为封建政治服务的结论，并指出“在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封建时代，利用商品经济以促进整个封建经济向纵深发展，从而更有利于封建政治的稳定和巩固，这是封建国家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可能起的一种积极作用”。可谓发前修与时贤之所未发，这亦已为史学界的同仁所公认。

谷霁光先生是老一辈的知识分子，青年时代就抱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志向，可是当时的现实粉碎了他们的幻想，他才开始追求民主和进步，拥护支持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和学生运动，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全国解放后，他进一步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振兴中国。他的生命好像获得了无穷的活力，以百倍的毅力和干劲从事教学、研究和学校的领导工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全心全意为人民工作，为学生服务。1990年末，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多少有点带总结性的意思说：“一生中，前半生沉湎于教学，历史学开过近廿门课，讲课作业认真，却不是讲五个环节之类，是着重内容，着重启发，自非照本宣科那么轻而易举。后来参与社会活动太多，虽然没有什么成效可言，时间却花费了不少。我认为这对治学有极大好处，但对我的处境实在太糟，我在社会活动中花去如许时间，确是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一种体现，妨碍了学术，曾不后悔，至于无妄之灾（指“文革”中定为“三家村江西分店老板”之事），也漠然视之。”解放以来的40多年间，迭经风雨和变故，但他对党的忠诚坚贞不二，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坚信不疑，对党对人民的事业竭忠尽智，老而弥坚。

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使教学和科研能跟上新中国蓬勃发展的形势，在原有的水平上更上一层楼，谷霁光先生曾在一段时间如饥似渴地研读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前些年，又研读邓小平、陈云等同志的著作。近年来，尽管高龄，还在攻读马、恩、列、

斯军事文集。40余年来，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从未间断，学习十分认真、系统和深入。因为他是在有科学研究作基础的情况下学习，所以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精神更容易领会和贯通。正如列宁所说，学者们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是在通过专业研究的途径来达到的，因而也是牢固的。学习的目的是力求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在文章中虽然很少引证马列的词句，但重在实践和运用，力求在史学领域中发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取得一般人所不能有的成就。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谷霁光先生的教学与研究面貌一新，撰写的讲义、论文比过去具有更高的水平，如《汉唐间一丁百亩的规定与封建占有制》、《论汉唐间赋税制度的变化》、《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等论文，都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后的丰硕成果。

1953年我开始做他的助教，从此我和他接触频繁，受益自不待言，了解也日益加深。

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完全是乾嘉学派的遗风。那种刻苦的精神，几乎令人难以想象。为了写关于山西票号的文章，几乎把明清时代的有关书籍翻遍了。他反对读聪明书，写聪明文，坚决不走捷径，尽一切可能阅读第一手材料，越是原始材料，越是要千方百计去找，没有找到誓不罢休。一旦到手，他就从头到尾，一本一本地看，卡片笔记，一张一张地写，完全是手工作业，认为“务必脚踏实地，稳步前进，宁可求其实，不可流于幻”。一次住宅起火，将他的图书资料、多年心血积存的卡片，付之一炬。可是春蚕吐丝，又重新开始，一张一张地记，疲劳了，就到菜园锄地，稍事调节。若干年下来，几万张卡片又存积起来了。今天看来，这种作法似乎使人觉得我们的科研手段有点落后，但这恰恰反映了谷霁光先生治学的勤奋。

无论是编讲稿还是写文章，他总是在搜集大量材料之后，才开始充分酝酿，有时如达摩面壁，久坐不动，反复思量。一旦贯通，即

奋笔疾书，中途从不停顿。5000—10000字的论文，往往一天或一昼夜完工，可谓一气呵成。从来没有见过他边看边想，边想边写的情况，没有什么拼凑成文、草率成篇的事。他的文章总是从大处着眼，纵览全局，把研究的对象放到历史的长河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去分析考察，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去认识历史的本来面目，决不就事论事，更不浅尝辄止。丰富的史料，辩证的思维，严密的逻辑，使他的论点牢固坚实，不可动摇。他告诉我写文章第一步是立意，第二步是布局，第三步是遣词。这是他的经验总结，也是他传授写文章的三步曲。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文章完稿后，必定征求周围同志和朋友们的意见，态度诚挚、谦逊，总说学海无涯，有什么评论，尽量发表。他对于我们学生、晚辈的意见，无论大小正误，同样认真听取，并且神色愉悦，闻过则喜。他的这种态度，也促使我们敢于大胆地畅所欲言。他的这种作法，已成为他撰写文章的一个工序。撰写文章的过程，实际是主观认识客观的过程。客观的事物是复杂的，要反映得正确，很费功夫。一个人的认识有限，多征求别人的意见，只会帮助自己的认识更符合实际，更接近真理。谷霁光先生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给我们很深的启迪和教育。由于他的文章一般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之后写成的，我们要提出质疑，很不容易。但是有时能提出一点意见，他就很高兴，我们也为能提出这点意见而感到喜悦。他曾说：“智慧加勤奋，乘以时间，等于成就。”在他身上，体现了那种刻苦钻研、精益求精、惜时如金、奋斗不息的精神，凡是与他接触的同 志和学生，都有这种感受。青年时期，在北京7年，只看了两场京戏。60年来，不旁务，不他求，放弃一切娱乐、游玩，也不看杂书闲报，专心致志，以全部精力扑在工作、教学和研究上。“八小时之外，奋斗终身”，是他的名言。每年暑期，省政协或省社联安排到庐山或井冈山休息疗养，他都婉言谢绝，而坚持在家冒暑奋战。患病以后，同志们劝他应以休息为主，他仍然坚持“学人不治学，虽活犹死”的

见解，认为“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奋斗不懈”。依旧读书作文，没有间歇。一次他用略带自嘲的口吻说：“至于我，写文章是小农经济，经不住灾害，抢收抢种，一季到手就算数，只要一息尚存，决不荒废。”

谷霁光先生既是学问家，又是教育家，学生数以千计，至于同一院校受他教诲、熏陶和校外前来求教以及通过阅读文章、专著而获益的人，那是无从计算的了。无论是直接受教学生、研究生、进修生，还是登门或来函求教的工人、干部、士兵，谷霁光先生的态度都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有问必答，经常一谈数小时，一信百千言。一年的信件，不下数百封。他不用助手代笔，都是亲自作答。送来征求意见的文稿，更是认真审阅，提出书面意见。有的文稿，不是一次二次，而是三次五次，甚至八次十次，不厌其烦地提出意见，诚心诚意地直到帮助把文章修改满意为止。这种诲人不倦、甘为人梯的精神，受到学生们的广泛称颂和高度赞扬。他对学生们的指导、教诲，不是随意性的，而是注重基本功，强调循序渐进，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和吸收最新科研成果，并要求有自己的创见，解决历史上的疑难问题。同时注意因材施教，既帮助解决理论上与专业上的障碍，又指出前进与奋斗的目标。在治学方法上有一系列辩证施教的思想，使我们受益匪浅。记得十年前我要求他为我写一个条幅，作为鞭策和留念。他对这样一件小事，采取了非常认真的态度，竟起草了一个稿子来问我是否可以，内容是“能笃学以益智，会当妙极乎专通而实践真理。记曰：宪章马列，笔削春秋，日新其业，无疆惟休”。过了几天，经过一番思索，又写出一个稿子问我中不中意，说是“内容拟改为：格物致知，复笃学以益智，会当秘极乎专通而实践真理，英华发越，无负韶华。记曰：胸有成竹又无成竹，目无全牛又有全牛，穷彼奥衍，唯真是求，辩证治学，克壮其猷”。对这个第二次稿，他自己评论为：“文在写实，亦宜不落俗套，别出心裁，从心所欲。仍不知此可表达本意否？尚须推敲。”推敲的结果，将上述一大段话改成了两句：“能豁达以益厥神智，复缜密而展其思维”。

认为“豁达大度，再豁达大度，仍是主要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会当如此迈进”。但是，他仍不以此为满意，随后不久，送给我“慎思明辨”四字，指出这是我“当前治学从政的中心注意点”。这四个字，是他对我的教诫训诲，自应终生不忘。而这件事本身，充分说明谷霁光先生待人接物是何等的认真。每当接到他不断修改条幅的拟搞时，我的心都久久不能平静。“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蹲牛棚，在木工间劳动，也是那样聚精会神，全力以赴，不到3年时间，师傅们说他已达到三级木工水平。“双抢”时，他下田挑谷，以花甲之年，每担都在百斤之上，师生们看了，无不感佩。

有一位和他要好的朋友，曾建议他多带弟子。他表示弟子要择师，师也要择弟子，不能张三李四不加选择地随便带一大帮徒弟。他主张带徒弟也应该少而精，要品德好、气质好，能好学上进。经他亲自指点的学生、助手，的确不很多，但在他精心教导下，都学有所成，有几位在史学研究上已很有造诣，有不少专著问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想集中时间抓紧进行中国兵制史的专题研究，开始向领导上提出辞去社会职务。他说：“不当人大代表，也不当省政协副主席、省民盟主委、江大校长，最多保留全国政协委员。以主力做学问，如果这是迂，也得迂下去。”他还进一步吟诗明志：“临崖挺秀一苍松，常有浮云似过从，直谓此真身外物，我行我素乐融融”。这期间，除发表了有关王安石变法的几篇重要论文外，对中国古代兵制的源起从文字学角度展开了深入的研究，连续撰写了《有关军事的若干古文字释例》（一、二）以及古代军队的方阵等论文。这也是“哀人生之须臾，羨长江之无穷”。自知老之将至，对时间看得很重很重，抓得很紧很紧。

可是，岁月不饶人。1983年秋，因脑血栓引起半身不遂，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他仍然埋头书案，研究兵制中的问题，亲朋好友劝他善自保养，珍重身体，他却回答说：“文章未必催人老，风物长宜放眼量”。1984年出院后，在家疗养，既无事务缠身，也无头衔拖

累，可他“人闲心不闲，名亡志不忘”，以抱病之身，继续奋战不息。

他有一种大学者才具有的睿智，对学术以外的一些问题，我们也常常向他请教。他的分析既深刻而又辩证。他用解剖历史的牛刀分析现实，古今相通，自然就显得游刃有余了。他还非常坦诚直率，一次我心血来潮，想学做诗，竟去和姚公骞同志《西安咏古》的四首律诗，自知诗味缺欠，平仄不谐，征求一些朋友的意见，都说好话，唯独谷霁光先生提出了批评，并劝我最好不要做诗。

我从1950年做他的学生到现在的40余年间，从没见过他计较个人得失，无论顺境、逆境，都不在意，有时甚至给人一种同忧喜、共荣辱的感觉，真是胸怀宽广，炉火纯青。他也从不考虑生活的舒适，长年累月，饮食简单，衣着朴素，自奉俭约。在他身上有那么多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共产主义的高尚品德，并且水乳交融般凝合在一起，成为广大师生的表率。

谷霁光先生的成就，决非一枝一叶，涓涓细流，乃是森森大树，不渡江河，在史学界早有定评，不必赘述。字如其人，文也如其人。只要读了《谷霁光史学文集》，就能清楚地知道他。这里挂一漏万地说点他的为人处世和治学精神，不过是想与《文集》相印证，让不熟悉他的读者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他，以求增加一些亲近感。如果能达到这样的目的，我的任务就算勉强地完成了。

《史林漫拾》序

罗尔纲

47年前，我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做整理艺风堂金石拓片工作。这份金石拓片共三万多份，是清代学者缪荃孙收藏的，后来流落到他方去，经蔡元培设法收归北大，设专室保藏，可是多年无人整理，蛛网灰尘都满了。当时北大在北京城内，文科研究所在松公府。霁光同志每天从西郊清华大学进城，到我的工作室来，阅看那尘封已满的北朝、隋、唐的金石拓片。那时候，我和霁光同志初相识，想不到像他那样英风勃勃的青年，竟能同书呆子一样坐得住、干得下、钻得进！结果，收在《二十五史补编》里那两篇《补魏书兵志》、《唐折冲府考校补》重要著作，就是这样长年累月，无间寒暑，在寂寂的斗室里，比淘沙取金还要艰苦的工作中得来的。

后来，霁光同志去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每星期六下午来北京，住在我家，星期天下午回天津。他这样每周必来北京是为的要到北京图书馆去看书。我看今年一月廿三日《南昌晚报》发表的朱昌勤《访历史学家谷霁光》的报道，说他在北京7年，只看了两场京戏，因为他珍惜时间，把时间全部都付与书了。霁光同志看的两场京戏，有一场我也有份，那是他和我还有几个朋友，为了庆祝一位朋友的父亲到东北去接被日本关东军逮捕下狱出来的哥哥而请看杨小楼长板坡的。我身体不好，怕看戏影响工作，也还应过

一位长辈的邀约，不得不陪同看过一场程砚秋青霜剑。对人人喜爱被称为中国独特的艺术的京戏，霁光同志身体那样朗健，却并不比我看得多。这就可见他当年是如何地把生命浸埋在书中了。霁光同志这样地钻入书中，不是为的“颜如玉”，更不是为的“黄金屋”，而是为着要发掘历史事实，去追寻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回想当年我们在北京共同工作，往事历历，如在目前。到1937年8月，北京沦陷，我们同路南归。从此分飞，再不曾得到共同工作的机会了。每读杜甫《春日忆李白》“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之句，辄深惆怅。前两年他寄来近作《梁山泊农民运动与宋江起义》商讨。不久，又接来信，把在座谈会上青年同志举出古人说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话来策勉。喜悉年逾古稀，努力加鞭，不减当年。去年秋，就寄来新出版的《中国古代经济史论文集》，昨天又寄来即将付印的《史林漫拾》嘱写序言。

霁光同志这部《史林漫拾》，从时代说，上起古代，下迄清末。从体裁说，有理论探讨，有论述，有考证，有校勘。从内容说，有农民运动史，有政治史，有社会史，有战争史，有民族史，有地理史等等，真正是郁郁苍苍，奇花异果的史林。其中许多篇文章，我都是第一个读者。现在，就以一个得先睹为快的读者来谈谈读后感吧。我感到著者有四种研究方法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留意于通与专的辩证关系 例如《北魏地方官制》一文中，北方一州可以有三个刺史，一为北人，一为久附的汉人，一为新附汉人，为前人所未道，这是专。后来元代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之称；清代军队有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之目，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融合，十分艰巨复杂，立意在通。又如《四论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不是就事论事。西魏、北周承认私兵势力纳入皇朝统辖系统，结果统一局面逐步形成，单从府兵制本身是得不到这个结论的，一定要弄通北魏、隋、唐整个形势才能理解得到。专与通的辩证论证，结论也就比较正确。

第二、注意于现象与本质的区别 例如《唐代皇帝天可汗溯源》两文，隋代皇帝已是被西北少数民族作如此称呼，现象上皇帝与天可汗是“分”，而统一等称为“合”，“合”是本质，“合”中寓“分”，“分”之中以“合”为主体。又如《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和《王安石经济思想若干问题试析》，许多改革项目可作现象来看，核心却是围绕“商品经济”来进行的。改革中心是经济，不能一一平列，以免见木不见林。

第三、注意整体与局部的辩证关系。 例如《梁山泊农民运动与宋江起义》，不是孤立的看宋江起义，而是从整个战略地位的梁山地区看不相连属又相连属的长时间、广范围的农民运动，为研究这一时期这一地区农民运动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在霁光同志有关兵制研究中，此种事例更多，如《城民与世兵》、《良家子与私装从军》等，把汉族与少数民族、封建中期与封建初期与奴隶制后期等错综复杂关系理出一些头绪来，整体变化与局部变化的关系，可以一目了然。

第四、注意源与流、因与果的辩证关系。 例如《崔浩国史之狱与北朝门阀》，兴狱在压制门阀，实亦树立拓拔等门阀，后来北周推崇三十六姓、九十九国即其一种表现。又如《宋代继承问题商榷》，整个宋代继承问题的间断与延续是宗法制度下的必然现象，未可纯粹视为偶然。历史研究当然不能割断历史。唐代的曹州，历称“盗区”，京城东移，郓州代曹州而又为农民起义中心，一直到都城南移为止，势所必然。

以上四点，都是霁光同志五十年来在历史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他怎样取得这些成就呢？就我所知，是从两方面得来的。首先，他是一个极懂得古人说的“由博入专易，由专返博难”的道理的人。所以他力求知，无书不看。《南昌晚报》报道他看书，不是挑书看，不是找书看，而是“倒架”看，把图书馆里架上的书都看光。又说他看书是“倒本”看，从卷首倒卷尾，字字过目，真是描写得透彻。把我要

说的话都说尽了。就因为他这样的博览，才具有博古通今的知识，才能对他所专研的唐、宋史，得到了真正的“专”。另一方面，秉光同志同我这种书呆子不同，他是个精明干练的人才，社会是不会让他做书呆子的工作的。他从40年代的后期起，就在大学里任过史学系主任。到解放后，他还担任不少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他不但没有把研究工作抛掉，反之，他却很好地把社会锻炼、业务锻炼与研究三结合起来而取得今天的成就。对后者来说，在我所识的同志中，也有才华卓绝、精力过人的人，但在他们担任行政领导工作之后，就不能再做研究工作了。此无他，就因为他们没有同秉光同志这样把社会锻炼、业务锻炼与研究锻炼很好地三结合起来而已。对前者来说，使我感慨更深。我由于不懂得通与专的辩证关系，研究太平天国史，就只专读有关太平天国的书籍、资料，与此无关的一概不读，以为这样不致浪费时间，殊不知适得其反。我阅看有关太平天国的书籍、资料不为不多了，而对自己所要求的“专”，却还是距离十万八千里！可叹我于1931年就开始研究太平天国史，直到40年代研究天历时，因为没有历法的知识，才认识到要求“专”，必须先“通”的道理。其后有关太平天国史的种种问题，诸如政体、军事、社会以至艺术、建筑、戏剧、音乐等等问题，一件件提了出来，使我处处感到不“通”，缺乏知识去进行研究。举个例子说吧，请同志们不要见笑。我在50年代初，出版的《李秀成自述原稿笺证》一书，在卷首印有《李秀成自述原稿》和《李秀成致李昭寿书》，及《李秀成答辞手卷》三种照片的对照，说三者都是李秀成的手迹，以证明《李秀成自述原稿》并非赝品。到1956年，有同志把我书上的《李秀成自述原稿》和《李秀成致李昭寿书》两种笔迹照片送请法医研究所专家鉴定，经法医研究所的专家鉴定不是同一人的笔迹。这位同志在刊物上据此发表论文断言《李秀成自述原稿》为曾国藩伪造。那时，我在南京工作，正在青岛养病。组织上派了一位同志来看我病。那位同志，是一位精通书法的人，他把两种照片看了，也认为不是

同一人的手笔，劝我把笔迹对勘这一点放弃。不久，我从青岛到北京医病，我心里总放不开这事，我认为多年来我细看这两种文件的笔迹神韵完全一致，我并没有错。但是，神韵是抽象的，怎能使人信服呢？从冬天苦思，经春历夏，想不到办法解决。有一夜，我忽然想起，试把那两种的笔画拆开来对照看看，这样一拆，同是一人的笔迹，就具体地显现出来了。我寄去南京给那位同志请教。他看了，笑对同志们说：“罗先生做对了，他用的正是书家八法，他却不知道书家八法。”他立即回信给我，教我去借宋陈思《书苑精华》、明张绅《书法通释》、明潘之淙《书法离钩》、清《佩文斋书画谱》、清冯武《书法正传》、清程瑶田《书势》等书来读，明白书家八法后，就用八法理论来说明我所拆的笔画对照。我照了这位同志的指教，学懂书家八法后，才写成了一篇《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举例》（此文刊于1958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忠王自传原稿考证与论考据》），取得书法专家与史学界的同意，解决了《李秀成自传原稿》的真伪问题。谁知道研究太平天国史，必须要懂得书法知识呢？然而事实却是这样，你不懂得书法，就不可能解决《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真伪这一个问题。这一件事，使我深深地感到不“通”，不“博”，就不可能去做“专”业。可是，霁光同志在年轻时他就懂得这个道理了，他一生就受用不尽。而我在开步走时，就把先后颠倒了，致使直到今天，还不时在碰壁，实是不免于感慨万千。

这篇率笔直书的急就篇，说不上序文。只是把我读后的观感，特别是我感到的教训说说，以供青年同志们的参考吧。

1981年2月4日春节前夕谨序于北京。

《史林漫拾》序

熊德基

谷霁光同志是我平生畏友之一，现在他又将有关中国经济史和兵制史之外的论文，结集为《史林漫拾》。自内容而言，上自先秦，下至晚清，既有历史事件的探索，也有名物制度的考释，可以看出，这也是他过去四十多年漫步史学领域留下的足印，一步一步都下过功夫。我这样说，决非出自私人的交谊，而是他的劳绩加深了我的几点体会。

我们是1946年春相识的。当我在30年代初从《廿五史补编》中读到他的《补魏书兵志》和《唐折冲府考校补》二文时，误认为必是一位专治北朝和隋唐史的老儒耆宿所作。乃至此次见面，才知他还不到40岁。当时他正摊开《东华录》在抄卡片（那时江西没有《清实录》）。晤谈中我发现他很广博，此后只要看到他的论著必读一过。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史料真浩如烟海，为研究方便，治中国史者不得不自断代入手。但历史毕竟是有延续性的，任何历史事件都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波澜。尽管搞断代的专题研究，如果目光局限于一隅，不了解它的渊源和流向，这种论著不论考证如何精审，若置之通史之中，往往上下之间，扞格难通。而他考释唐代府兵制度，即远涉及西汉。因此，搞断代史也必须“胸罗千古”才行。可知“专”与“通”、“广度”与“深度”是不可分割的辩证的统一。